

中國不能扮演歐洲救世主的角色

喬新生教授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

中國願意幫助歐洲解決債務危機問題，前提條件是中國必須擁有話語權。換句話說，在國際金融市場和歐洲的金融穩定基金之中，必須承認中國的存在。如果中國注入資金，卻沒有任何的話語權，不能參與穩定基金的決策和管理，那麼，中國當然不會把自己的金錢投入到無底洞中。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瑩在中國外交部「藍廳論壇」上發表演講，認為中國不是舊式強權國家，毫無利用金融工具謀取權益的打算。中歐之間的合作關係是互利互惠的，在歐洲應對主權債務危機之際，中國通過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注資、購買歐洲債券和增加進口、擴大企業投資等方式，支持歐洲國家增加就業和恢復經濟增長，這同時也有利於中國的發展。今後中國將繼續參與國際社會和歐洲一道克服危機的努力。在回答記者問題的時候，她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救助歐洲命題不成立，因為錢不是這樣用的」。海外新聞媒體在報道這一新聞的時候普遍認為，作為世界上最大外匯儲備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直截了當的表明中國的立場，中國不會為歐洲援助基金——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提供資金。

歐洲只強調中國的義務而忽略權利

這一表態或許能夠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國與歐洲關係的微妙變化。歐洲一些國家爆發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國家領導人公開表示願意幫助這些國家渡過金融難關。中國國家領導人在歐洲訪問期間，多次表態願意幫助歐洲國家擺脫金融危機。然而種種跡象表明，歐洲國家在處理經濟危機的時候，似乎忽略了中國的感受，在一些重大決策方面作出了不理智的舉動。中國要求歐洲給予中國正常貿易國家待遇，這本來是一個合乎情理、水到渠成的安排。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歐洲國家的領導人居然出爾反爾，一方面表示積極支持中國成為國際貿易大家庭平等一員，另一方面卻斷然拒絕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中國為了取得平等的貿易地位，不得不再忍受五年時間。這對於一個正在崛起的貿易大國來說，所帶來的精神上的屈辱遠遠大於遭受的經濟損失。

中國不能扮演「散財童子」的角色

中國願意幫助歐洲解決債務危機問題，前提條件是中國必須擁有話語權。換句話說，在國際金融市場和歐洲的金融穩定基金之中，必須承認中國的存在。如果中國注入資金，卻沒有任何的話語權，不能參與穩定基金的決策和管理，那麼，中國當然不會把自己的金錢投入到無底洞中。中國現在需要的是權利和義務對等的條件，歐洲國家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中國是在爭取他應該得到的東西。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外匯儲備，這對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儘管不少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外匯儲備過多，但這是歷史原因造成的，不能因為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外匯儲備，而要扮演「散財童子」的角色。中國在外匯經營管理過程中，始終要堅持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的原則，不能因為自己的外匯儲備數額龐大，而無償援助其他國家。

當今世界金融市場發展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西方國家在金融衍生產品開發和交易的過程中，不斷地放大風險，並且利用自己的話語權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風險。對於歐洲所發生的金融危機中國避

之唯恐不及，當然不願更深地介入歐洲國家的矛盾中去。中國堅持平等互利的原則，願意與歐洲國家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但顯然歐洲主要大國不這樣看，他們希望中國給予更多的援助，卻不希望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擁有話語權。這種強人所難的做法，不可能被中國所接受。西方一些新聞媒體所散佈的關於中國利用金融工具謀取權益的打算，實際上是一種不合邏輯的分析。金融產品本身就具有營利性特徵，中國利用自己的外匯儲備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獲取利益，不僅是正當的權利，而且也是今後中國外匯經營的目標所在。不能因為西方國家面臨金融危機，而阻止中國在金融市場小心翼翼地從事外匯交易。中國不是任何國家的殖民地，也不是西方國家的附屬國，中國是一個擁有金融主權的獨立國家，在外匯經營中不需要看別人的臉色。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應當積極利用自己的外匯儲備，提高自己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這是典型的倒因為果。如果中國的外匯投資經營機構缺乏必要的能力，導致中國外匯儲備損失慘重，那麼，非但不能提升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反而會讓人家瞧不起。只有充分運用中國的外匯儲備，在波詭雲譎的外匯市場獲得更多的利潤，才會讓一些市場經濟國家刮目相看。

規範海外投資行為 營造有利輿論環境

中國當前堅持穩健的外匯投資政策是正確的。但是，從經營的結果來看，還不盡如人意。中國在外匯投資方面，過多地聽取美國金融投資者的意見，從而導致中國的投資方向 and 投資領域存在着嚴重的問題。當今西方國家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如果在西方國家從事外匯投資經營，必然會遭到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者的阻撓。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開闢第三世界國家市場，利用中國的外匯儲備，改變中國的投資結構和貿易結構，在富饒而美麗的非洲和拉丁美洲擴大中國的貿易投資數額。只有這樣才能避其鋒芒，確保中國外匯投資獲得穩定收益。

中國不謀求經濟以外的國際利益，但並不意味着中國的經濟活動不會產生政治上的影響。事實上，近些年來中國在非洲一些國家的貿易投資，已經引起歐洲國家的高度關注。這些國家的新聞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中國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消息，並且刻意地渲染中國投資者與當地居民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是一種典型的「酸葡萄」心態。中國政府一方面要據理力爭，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另一方面也要提醒中國的企業在海外投資的過程中，必須注意當地的法律和合同的約定，在處理與駐在國居民糾紛的時候，注意平等互利的原則。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未雨綢繆，盡快制定《海外投資法》或者《海外貿易法》，全面規範中國企業海外的投資行為，把中國的對外貿易投資納入法律的軌道。只有這樣，才能防止一些西方國家的新聞媒體不懷好意，在中國的外匯投資方面說三道四，惡化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

田園快語

一個地方的空氣質素不但關係當地居民的健康，亦是競爭力一個不可或缺的指標。偏偏坐擁種種競爭優勢、躋身國際大都會的香港，空氣質素卻總是不盡人意，即使政府一直強調已做了大量工作，仍是成效不彰。在最近一個星期內，便接連有兩個國際調查顯示，本港的空氣質素在國際的排名都是遠遠落後於人，甚至敬陪末座。我認為，對於現屆以至下屆政府而言，這些都是不容忽視的警號，顯示本港亟需果斷的政策措施，來改善空氣質素。

空氣污染嚴重損港吸引力

在個多星期前，世界衛生組織公布全球565個城市空氣污染物「微細懸浮粒子」PM2.5的濃度報告。有本地環保團體把從環保署取得的數據與該排名榜比較，發現每年平均值達每立方36微克PM2.5的中環鬧市，在全球排名倒數第八，即是變相排名559位，比排名534的菲律賓馬尼拉，以至秘魯利馬等發展中城市還要落後。香港並因此被譏為空具國際頂級城市之名，卻有「九流空氣質素」。正如醫學界所指，微細懸浮粒子直徑僅2.5微米，可穿透口及鼻毛直達心肺，影響人體健康。但是當局對此問題似乎愛理不理，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在電台節目只是回應指中環不代表全港空氣質素，但同時承認要提升香港的排名，挑戰愈來愈大。

相隔4日後，跨國人力資源顧問機構美世(Mercer)公布《2011年全球生活質素調查》報告，根據政治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經濟發展、住屋及國際學校名額等10項指標，評估逾400個城市對外籍專才的吸引力。本港今年排名雖然較去年上升1位，位居全球最佳居住城市排行榜的第70位，不但被受地震及核輻射

事故影響跌至第46位的日本東京大幅拋離，而比諸排於亞洲首位、全球排25名的新加坡，更可謂是「輪幾條街」。

有關調查員解釋，空氣、垃圾和噪音污染問題一直是香港排名落後的主因，反之，新加坡除了媒體審查及消費品供應稍遜香港之外，基礎設施、改善污染程度等都遠勝亞洲其他城市。有人力顧問坦言，本港空氣污染嚴重，令不少外籍專才都選擇移居其他城市發展，不利本港吸引人才及投資。

政府需加強改善空氣規劃

我盼望有關方面要認真正視以上這兩項調查，及積極改善，切勿因為遇到困難，便踴躍不前。例如環保署指PM2.5極受區域因素影響，若要達致世衛標準，則連遠離市區的塔門也未能達到；這番話固然顯示了解決本港空氣污染問題不容易，但亦同時顯示必須從粵港雙方更緊密合作方面着手。就此問題，過往我以全國政協委員身份已向中央多次提案，促請加強內地與香港的相關合作，與此同時，特區政府的積極爭取亦是不可或缺的。可惜有關方面進展始終緩慢，如粵港於2009年已簽訂了「粵港環保合作協議」，同意共同研究珠三角地區2010以後的減排安排，但至今雙方只是成立了小組、準備訂立減排目標，而具體一點的建議如排污交易等，仍只聞樓梯響，實令人失望。

在本港內部而言，政府亦需加強做好全盤規劃，及定出成效指標，切實改善空氣質素。例如，當局現行的空氣質素指標已沿用廿多年，而有關的諮詢工作完成至今亦已有兩年，實應盡快訂出更新建議。此外，亦應多推出鼓勵性的措施，促進舊型商用和私人汽車的淘汰與更新，改善路邊空氣質素。總之，各位現時及未來的領導人在推動本港成為國際一流城市的宏圖時，都要規劃一流空氣，兩者才可相輔相成，持續發展。



■本港空氣質素不盡人意，不利吸引人才及投資。圖為空氣污染指數錄得甚高水平的維港景色。

工黨是反對派內訌的遮醜布

馬彥

所謂「工黨」實是反對派內訌的遮醜布。反對派不斷「推陳出新」產生新組織修補既有政治關係，然而在反覆循環的過程中，能量不斷耗損，越來越少。他們名之曰「民主光譜光芒四射」，但名目亂套也不能說明反對派翻來覆去的亂狀是有民主說服力的。

由職工盟立法會議員李卓人牽頭的工黨將於本月十八日正式成立，表面聲稱集結勞工力量謀取工人利益，強化反對派的團結形象，潛台詞即反對派一再派生了一個可以統合更多衛星組織和散兵游勇的核心政黨。反對派內部的分化，自區選後更為明確，其核心問題在於理念相異，成立工黨只是反對派內訌的產物。不過工黨在香港是新政治概念，包裝新穎，醒人耳目，以工黨另起爐灶，即遮掩了反對派分裂的新裂痕。

李卓人在上月反對派飯盒會上曾表示，即使黃毓民、陳偉業和梁國雄不為派內頭頭接納，飯盒會仍無意剔除任何政黨。不過言猶在耳，他和部分反對派中人就另起爐灶，成立工黨。成立工黨的理由，表面義正辭嚴，背後卻至少可以看到，工黨的成立正是反對派內部分裂的結果。

工黨志在爭奪激進路線的大旗

首先，工黨在其他國家多屬中間偏左的非保守甚至是激進組織。工黨的性质，不可能採取溫和而非左翼路線，這已預示這個新工黨可能與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在政治光譜上同屬一格。如果工黨與職工盟以往的手法無異，那是無法突顯工黨的存在意義的。李卓人現階段已透

露，工黨主打「金融霸權」和「地產霸權」兩大議題，不滿財富分配不公和官商勾結現象，稍後更會發起民間抗爭行動為工黨打頭炮，抗爭味道十分濃厚，不再停留於零碎式工會罷工層次。由此觀之，李卓人等將在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的粗暴式激進政黨以外，另立新激進黨派，其最大分別只是後者「工」字掛帥。

不過，既同屬激進派系，反對派何以成立工黨抗衡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呢？雖然新工黨當中激進成分為何有待觀察，但幾可肯定的，是反對派內部不認為人民力量 and 社民連能在反金融地產霸權兩大議題上有作為，以致反對派內部有需要另起爐灶，重奪激進路線的大旗，取代兩大激進黨派的領導地位，同時改變粗暴形象。

反對派分散惡化能量耗損

其次，這個新成立的工黨，現正積極聯絡多個民間團體和社運組織加入，以求年底前會員人數增至三百多人。除李卓人外，工黨班底還包括前進聯盟成員暨前公民黨黨員張超雄、前前綫召集人和公民起動召集人何秀蘭、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張國柱、職工盟統籌幹事譚駿賢、關注綏援檢討聯盟組織幹事歐陽達初等等。這些原本四散各處的反派衛星組織和散兵游勇，多屬反對派舊將，卻再次在這個新工黨號結下重新聚集起來。然而，如果原有力量並不分散，反對派內部毋須成立新組織去統合舊人馬，這已從反面說明工黨作為規模更大的新統合政黨，只是派內防止分散惡化的救亡組織。

總而言之，所謂「工黨」實是反對派內訌的遮醜布。反對派不斷「推陳出新」產生新組織修補既有政治關係，然而在反覆循環的過程中，能量不斷耗損，越來越少。他們名之曰「民主光譜光芒四射」，但名目亂套也不能說明反對派翻來覆去的亂狀是有民主說服力的。

「地從何來」不是問題

李民理

「大興土木，建設住房。」這大抵是香港市民着眼於未來的最大一項共識。廣大市民希望「安居」，方能「樂業」，這是市民生活的根本。

增建房屋是社會共識

從供求規律的基本點說，樓價是否正常及合理，樓市能否滿足民眾的需求和顧及民眾的利益，應是房屋政策的核心之點。不論何國何地，房屋的供求，理當原則上、基本上保持平衡。供過於求，當然不好；供不應求，更加不好。一個以民為本、體恤民情的政府，照說應該對每年的房屋供應有一個比較全面、符合現實、具前瞻性的正確估量。

就政府的責任而言，能否平衡地讓樓市正常發展，做到供求兩不誤，關鍵是在每年推出的土地數量是否合理，是否能達致房屋大致上供求平衡。延伸一些說，「高地價」政策不對，「低地價」政策同樣不妥。但最近六、七年的政策失誤，顯然在「高地價」三字。換一個方式說，這幾年推出的土地，數量明顯不足，結果是搶高地價，推高樓價。

增加土地供應有多種途徑

要多建房屋，要增加土地供應，就不能不面對以下問

題：地從何來？以筆者觀之，土地來源至少有三項。

其一，市區重建。這方面要大力推動，包括公屋重建。一來，可以改善環境；二來，可以改善居民生活條件；三來，市容必然更為美觀；四來，現代建築科技可向上空發展，這就相當於增加了土地供應；五來，市區重建局畢竟不是地產發展商，具不同意義。

其二，填海造地。人類自古以來就採用這一方式求生存、求發展，香港也不例外。香港比較特殊的情況是，維港兩岸不能再填海，這已經是全民共識。除此之外，港島東西南部，九龍半島東西兩側，以及新界許多濱海地區，都是填海的地方。考慮到充分利用現有的交通和社區設施，不少地方也確實有必要進行填海造地。

其三，新界開發。說「地少人多」，不是誤導，也是陳腐觀念。香港一千餘平方公里的地域面積，已被利用發展的大約只佔十分之一，還有九百平方公里的「未開發處女地」，香港怎麼會「地少」呢？這類「處女地」，絕大部分在新界。假如解決好交通問題，在新界大建房屋絕對可行。梁振英或唐英年上任後，會不會考慮在新界發展幾個新市鎮呢？

香港要多建住宅的新房屋政策，在土地方面有實質的條件支持。地從何來？大有充分解決的餘地。

自由社會的再思

顧耀輝 腦神經專科醫生

前些日子接二連三發生了孩童、青少年自殺事件：一名小五學生遺下日記說「好想死」而自殺，過了不久，又有一個17歲青年與父親發生口角，情緒激動，又說「想死」。然後，又有一名IVE生在校內跳樓自殺。為甚麼現在的青年人動輒都想以死解決問題？在電台的烽煙節日裡，有些家長歸咎於學校，再追溯開始就是政府的教育制度出現了毛病。每當學童或者青年人發生了問題的時候，大家首先就會問責，是誰需要為這班青年人的行為負上責任？家長？學校？政府？社會？筆者在醫期間，聽了很多故事，發現不少家長都會把責任歸咎學校、政府或者社會；學校也會把責任推到政府的教育制度。究竟誰要為青年人的行為負上責任？筆者認為每一方都有責任，因為每一方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從不同的層次影響着青年人的思想。無論是誰需要為青年人的行為負上責任，筆者認為在問責的同時，有一點更值得大家討論和關注，這就是我們這個世代的價值觀是否出現了問題。良好的教育制度也要建基於恰當的價值觀，也要有恰當價值觀的人協助執行。

青年人價值觀出現問題

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可是大家有否想過要一個怎麼樣的自由社會，要怎麼樣教育下一代運用他們的自由。小五學生說想死就跑去死，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如果自由的意思就是我們想幹甚麼就甚麼，那我們憑甚麼認為小五學

生做得不對(在這裡，筆者假設了自殺是不對的行為，至少大部分人也認為不恰當)？又或者，我們憑甚麼阻止小五學生自殺？這只不過是小五學生的個人選擇。17歲青年人說想死，這也是他的個人選擇，為甚麼我們要阻止他去做他的選擇？當這些青年人說想死就跑去死，那就表示他們認為他們有這樣的自由，不然，IVE生就不會頭也不回，跑去死了。有些人認為這種自由很自我中心。筆者跟了不少青年人接觸和相處後，發現不少青年人的確很自我中心，他們所理解的自由就是他們有權去做他們喜歡的事，他們的行為乃是他們的個人的選擇，彷彿叫別人不要干涉他們的行為。也許，我們的教育並不是想塑造下一代成為自我中心的人，但事實上，我們的教育卻使下一代變得自我中心，在運用個人的自由時，不懂得考慮對其他人的影響，就好像小五學生自殺，如果他在自殺前有想一想他死了對父母親人的打擊，悲劇就不會發生。

教導學生運用自由

自由是可貴，但筆者認為我們需要花多點工夫教導學生如何運用他們的自由，這需要父母、學校與政府彼此合作，不只是單一方的責任。如果我們的教育是培育學生在做每一件事前都考慮對其他人的影響和傷害，筆者相信我們的下一代不會說想死就立刻跑去死，家長也不會抱頭痛哭，頓失愛兒。